

赋中论赋：汉代赋学批评的另一种形式

冷卫国

赋是汉代的“一代之文学”，赋学批评也自汉代而肇其端。班固《两都赋序》称：“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汉赋的创作盛况，由此可见一斑。汉代赋学批评的材料，主要保存在史传、子书、奏议等文献中，除此之外，班固《两都赋》、《答宾戏》以及张衡《二京赋》和张超《请青衣赋》中的赋论，同样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些材料使汉代的赋学批评呈现出了另一种独特的形式。

一 班固《两都赋》、《答宾戏》中的赋论

班固的赋学批评，主要保存在《两都赋序》，《汉书》之艺文志、传赞、叙传当中。除此之外，其《两都赋》的末尾，借西都宾、东都主人之口说了如下一段话：

主人曰“复位，今将喻子五篇之诗。”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此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唐章怀太子李贤注：“杨雄作《长杨》、《羽猎》赋，司马相如作《子虚》、《上林》赋，并文虽藻丽，其事夸诞，不如主人之言义正事实也。”（《后汉书》卷四〇《班固传》李贤注）如此解释，可谓得其环中。

班固的“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把马、扬之赋树立为崇高的典范，另一方面，又对马、扬之赋夸诞不信的藻词丽句表示不满。强调征实，是班固的一贯思想。他评论《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他批评《离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班固《离骚序》，见王逸《楚辞章句·叙》），认为“扬雄《美新》，典而亡实”（班固《典引序》，《文选》卷四八《符命》）。所谓“事实”，即强调信而有征，如果覆按《两都赋》对昭阳宫的描写，可以看出几乎与史籍的记载完全一致；所谓“义正”，则是强调歌颂封建礼制、明君贤臣。与马、扬同类大赋相比，班固的赋作在“义正”

与“事实”两个方面都有所强化，《两都赋》即是其典型表现。而且，在“义正”与“事实”之间，后者是服从于前者的，在《两都赋》中，一切“眩曜”，皆围绕“法度”而搞辞敷彩。

班固虽然强调“义正事实”，但在一定范围内他又认为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适当的夸张、想象又是必需的。班固在评述扬雄《甘泉赋》时指出：“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党（倘）鬼神可也。……”（《汉书》卷八七《扬雄传》）这与西晋时期左思所强调的无论任何描写都要一一考证校验，把艺术真实完全等同于生活真实的“征实”原则又是不同的。

“义正事实”，代表的是封建时代正统的审美理想，《两都赋》由此也成为《文选》的压卷之作。而且，这与班固对梁竦《七序》的评论也是一致的，他所说的“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后汉书》卷三四《梁竦传》），基本上仍可纳入“义正事实”这一评判标准之内。“义正事实”，从消极的方面讲，在思想内容上必然容易沦为服务于封建礼制与王权的功利主义文学。侯外庐先生曾经指出：“两汉的班氏，自始即赋有边疆豪强的传统及正宗的家学渊源”，班氏家族与班固一生的所作所为，“皆是两汉儒学宗教化、学校寺院化、帝王教皇化、学者神甫化演进程序上的产物。理解了这些情况，然后始可以理解班固的思想”（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9页）。对班固的赋论，亦应作如是观。

除此之外，在《答宾戏》中班固还曾提出过“为文自娱说”。“仆亦不任厕技于彼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这里的“斯文”，不只包括篇章著述，也应包括辞赋在内。在班固看来，以文章著述为业，“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间”，能够“纳乎圣听，列炳后人”，这与曹丕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又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此亦不可不察。

二 张衡《二京赋》中的赋论

在张衡《论贡举疏》中有一段赋论文字，但根据齐天举先生的考证，这段文字不是出自张衡而应属蔡邕，已成定论（见齐天举《〈论贡举疏〉辨》，《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一辑）。但是在《二京赋》的末尾有这样一段文字，实则也是一条重要的赋学批评材料：

坚冰作于履霜，寻木起于蘖栽。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初制于甚泰，服者焉能改哉？故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聘羽猎之辞，虽系以隳墙填堑，乱以收置解罟，卒无补于风轨，只以昭其愆尤。

“隳墙填堑”，系出自司马相如《上林赋》的末尾“隳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收置解罟”，出自扬雄《羽猎赋》的末尾“放雉菟，收置罟，麋鹿刍菟，与百姓共之”。张衡认为，司马相如、扬雄在赋中用大量篇幅描述天子苑囿的广大，铺写天子游猎的壮观，最后或写天子悔过自新，推倒城墙，废除苑囿；或写天子罢止畋游，还猎于民，然后归于料理国事的正道等，这样的写法，最终不但起不了规劝谏戒的作用，反而只能暴露天子的过失。张衡从作者的创作目的与作品的接受效果存在严重的悖离这一事实出发，既指出了以马、扬为代表的赋家所创作的散体大赋的局限，又提出了维护君统、反对暴露君过的辞赋创作原则。

显然，张衡接受了扬雄“曲终奏雅”、“劝百风一”的看法，扬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汉书》卷八七《扬雄传》），张衡与扬雄的赋学观念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但张衡与扬雄不同，扬雄因为意识到了散体大赋存在着“劝百风一”的局限而悔其前作，相反，张衡为了达到讽谏的目的，他在赋中除了进行大量的铺叙描写之外，同时强化了正面的议论与说理，如《东京赋》中“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议论，直率剖切，与马、扬大赋中反话正说、“主文谲谏”的风格相比，有着明显的改变，这显示了章、和之际的大赋创作复中有变、因中有革的轨迹。

至于张衡提出的反对暴露君过的思想，则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对《二京赋》的创作背景有过交待：“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章、和之际，社会依

然相对稳定，一片盛世景象，且经学气息更为浓厚。张衡的思想与当时的经学背景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早在明帝时期，官方意识形态对文史之士的文章著述就曾进行过直接的干预。永平十七年，明帝明确下诏：“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洵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班固《典引序》，《文选》卷四八《符命》）所以，处于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官方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不对张衡产生影响。张衡本人的思想虽兼儒、道、墨而有之，但维护君统、寻求与官方合作，则是贯彻在其诗、赋、文中的一贯倾向。龚克昌先生指出：“他对最高统治者一直持拥戴、合作的态度。他的所有诗、赋、文、疏，也大体是站在正统的儒家立场上，以儒家的经典为武器，来批判一切与之相违背的人事。”（详见《张衡赋论》一文，《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了解了以上诸端，也就可以清楚张衡为什么提出反对暴露君过的思想了。

张衡的讽谏说，一方面，直接继承了扬雄“劝百风一”的观念；另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又反对暴露君过，要求放弃“刺上”功能。显然，张衡的赋论更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从汉武到章和，从司马迁到张衡，赋学批评与经学发展的轨迹恰相对应，随着经学地位的日渐巩固及其渗透力的日渐扩大，辞赋创作与赋学批评也变得越来越符合儒家美学的“中和”原则，其批判精神也日渐软化、萎缩。

三 张超《消青衣赋》中的赋论

据《后汉书》卷八〇《文苑列传》：“张超字子并，河间郑人也，留侯良之后也。有文才。灵帝时，从车骑将军朱俊征黄巾，为别部司马。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于草书，妙绝时人，世共传之。”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张超的赋作，只有其《消青衣赋》一篇，见于《古文苑》卷六、《初学记》卷一九。

结合《消青衣赋》的文本来看，张超之所以创作《消青衣赋》，乃是缘于他对蔡邕《青衣赋》的不满。蔡邕在赋中描写了出身卑微，但聪明姣好、举止合度的青衣婢女，赞扬她“宜作夫人，为众女师”，并表达了对她的依恋思慕。张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历观古今，

祸福之阶，多由孽妾淫妻”，奉劝“勤节君子，无当自逸。宜如防水，守之如一”。在赋的开头，张超这样评价蔡邕及其《青衣赋》：

彼何人斯，阅此艳姿。丽辞美誉，雅句斐斐。

文则可嘉，志鄙意微。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显然，张超对蔡邕的词采风华是肯定的，但张超同时也认为，蔡邕此赋的主题十分低下，有伤风化。在他看来，《诗经》中的《关雎》是最好的文章楷模，他说“感彼《关雎》，德不双侣。但愿周公，好以窈窕。防微消渐，讽喻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诗赋担当起“防微消渐，讽喻君父”的功能。这种依《诗》立义的阐释角度——以诗比赋，强调讽谏，乃是汉代自司马迁以来就确立下来的赋学观念，也是汉代赋学批评最为突出的普遍性的特征。就张超的这段文字来看，只不过张超的观点比起汉代的其他赋论者更为迂腐罢了。

赋中论赋的形式，其来有自。《汉书》卷五一《贾邹枚路传》：“皋赋辞中自言为赋不如相如……故其赋有诋

嫫东方朔，又自诋嫫。”据此推断，赋中论赋的形式在枚皋赋中就已存在。只不过由于枚皋赋多已不存，所以，枚皋的这些言论也就归于湮没不彰了。

在辞赋鼎盛的汉代，出现的这种赋中论赋的形式，与在诗歌繁荣的唐代出现过的以诗论诗的形式颇为类似。李白的《古风》（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韩愈的《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和《荐士》（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诂），或以古体诗的形式论诗，或以绝句的形式论诗，而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更是以诗论诗的典型表现形式。后来较典型的，还有元好问的绝句组诗《论诗三十首》，等等。而上述班固、张衡、张超的赋论，其意义在于，使汉代赋学批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呈现出了另一种不同的批评形式，并且这样的批评形式，在魏晋南北朝的赋作中依然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应亨《赠四王冠诗》补正

陈松青

误应亨为东汉人，乃源于唐代徐坚等所编《初学记》。明冯惟讷《古诗纪》、清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辗转因袭。古直《钟记室诗品笺》、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等仍其误。然也有对此予以驳正者，如严可均《全晋文》（下文称严辑），曾培《初学记校记》，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下文称逯辑），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下文称曹著），而以逯氏的观点最富新意。《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发表周子来《应亨〈赠四王冠诗〉不是最早的五言诗》，但仍有不少人沿误不改。尤其是，这一错误写进了发行量近二十万册之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教材且将应亨诗序中的“外弟”误释为“妻弟”（第165页）。兹事体大，故笔者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追索，认为逯先生的结论大体不误，但有些看法值得商榷；此外，应亨的材料也有可补充的地方。

先看致误的源头。《初学记》卷一四《礼部》录有《赠四王冠诗》，题“后汉应亨”作，并有序云：“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并冠，故贻之诗。曰：济济四令弟，妙年践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虽无兕觥爵，杯醺传旨酒。”光绪十四年南海孔广陶本《北堂书钞》（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卷八四《礼仪部》五《冠》十也录有此诗，题作《贻四王子诗》，并有序，谓其作时为“永平年四月”，而非“永平四年”，加冠所涉的人物则作“外弟子王景系长世彻世从世母地蒋公”，与《初学记》所云“外弟子王景系兄弟四人”出入甚大。陈禹谟校刊四库本《书钞》，则不录序，无法借此查考应亨诗的作时及本事。

东汉明帝、西晋惠帝均有年号曰“永平”者。《初学记》之所以将该诗题为后汉应亨作，是将“永平”视为东汉明帝年号。逯氏诸先生的贡献在于指出“永平四年”、“永平年四月”的错误，因为惠帝永平元年三月即改年号为